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七六期 ——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05f)

---

【百家争鸣】评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	陶世龙
【往事回首】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迫害林枫的	梁红伍
【文革一页】受困于“文革”中的成都军区一把手	尹家民
【旧文回放】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	林豆豆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百家争鸣】

评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

• 陶世龙 •

### (一) 能如此研究历史吗？

清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唐少杰先生所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以下简称“唐著”），是2003年就在香港出版了，不过我是去年（2006）秋天回到北京才看到。从徐海亮先生对此书写的评论《我看清华文革——读〈一叶知秋〉》得知，这本以学术著作名义出现的书，对清华大学红教工及陶德坚等核心成员仍在沿用文革中诬陷不实之词。这就不能不予以注意了。

随后想起曾昭奋先生对我说过，唐少杰曾找他要过陶德坚的《风雨人生》，在“唐著”的参考文献中也列有这本书，但他显然并未尊重《风雨人生》中记述的事实，而如徐海亮先生所指出，“基本引用的文革派性辩论的资料”。当然，唐少杰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采用另外的说法，但作为研究历史，必须考订史料，力求作到符合历史真相，遗憾的是，唐少杰先生没有拿出经过考核，可以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甚至连引用的出处都没有，而他不是事件的亲历者，只能引用别人的材料。

据闻作者现在似乎已成了研究文革的专家，甚至介绍为“站在国际学术界的最前沿的精英中的佼佼者”（日照新闻网2006—07—31日照日报）但找来《一叶知秋》粗看一下，就发现问题不少，仅举数端即可见一斑：

“红教联”等搞出来的陈里宁事件完全是为了投机于当时的反刘少奇活动。

“红教联”提出了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

“红教联”还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政治地位即职位高低，决定了政治态度”，进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唐少杰著，200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49）

其实这些问题自1967年红教工的对立面贴大字报开始，到成为迟群控制下的专案组作为对陶德坚等定罪的材料，审查历时十二年之久，最后，德坚“要求在做结论之前开一个对证会，请把所谓我的反动言论的人证物证拿出来，我们当面对质，如果事实证明我确有那些反动言论，无论怎样处理都可以；如果证明那是诬陷不实之词，那么我要求，过去在多大范围批我，就在多大范围内给我澄清，还我以清白。”却无人出来负责，德坚也就理所当然地拒绝签字，清华大学党委也只能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同意她到了华中工学院。（陶德坚《风雨人生》：别了，清华！）

现在唐少杰先生不知得到什么有力的证据，要再断这场公案，那就该把证据拿出来公之于众，虽然德坚已不在世，但许多知情人还在，而且群众的眼睛的确是雪亮的，大家对比两方面的材料，不难辨别。遗憾的是唐少杰先生只有结论，一条证据也没有。其实在经过四十年后，许多人已能抛却派性或个人恩怨，历史真相正在恢复。如徐海亮先生所引述，红教工的对立面，文革开始前的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先生坦承：当时“四一四”是把在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们认为是反动的言论，都放到陶的头上。

但唐少杰先生在《一叶知秋》中却仍拾起这些已经破产的文革唾余。在那时，一些派性强或习惯整人的人，有这些行为不奇怪，遗憾的是据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唐先生，到现在却仍持有类似的思维方式，就太令人吃惊了。类似的问题还很多，这里不再列举，对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也没有展开，这只是一个开头，以后在会这里继续用事实材料一批驳。只想再说一下，唐少杰的研究中，暴露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忽视史料和对史实的考订。有《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之名，但全书正文有347页，仅有31页记述“百日武斗”。推演铺陈的空论占去很大篇幅。引用的事实材料大多没有出处，间有注明的，而其中《钱伟长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从历史角度看“文革”的政治意义》之类没有多少史料价值的文章，又占去一部分。参考文献和资料列出的篇目不少，但没有在书中引用处注出，也就无法得知作者究竟引用了那些。

有趣的是，作者在第23、24、25页上连续加注，指称他人的六部书或“通篇错误”；或“有一些时间、地点、事件、数字等方面的错误”；或“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这些批评或者是对的，但何以证明他们是错了，而唐少杰是正确的，也没见到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倒是《一叶知秋》仅仅看到第7页，就发现一个明显的硬伤，“井冈山红卫兵不断壮大，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最重要的是它已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支嫡系部队。证据有二：一蒯大富9月6日出任“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红卫兵三司”或“三司”）召集人”。正好当时参与“三司”建立和在那里工作的聂树人先生发来一篇《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把事情说的比较清楚，我就不多谈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于四十一年前开始的那段历史，记述错讹不少，有些是记忆或传闻

的错误，也不排除有人为了某种利益有意为之。所以纠正唐少杰《一叶知秋》中的谬误，对当前的文革研究或许是有意义的。

在许多基本事实尚未完全搞清楚的情况下就大发议论，是史学研究的一大忌，猛然想起，顾颉刚先生曾说过：“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察，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顾颉刚：《史学季刊》发刊词，1940）我以为这也适用于文革研究。

（二）陈里宁事件是“红教联”等为了“投机”而“搞出来”的吗？

《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中称““红教联”等搞出来的陈里宁事件完全是为了投机于当时的反刘少奇活动。”他所介绍的经过情况为：

1966年12月下旬，“红教联”在北京红卫医院（原称安定医院）发现了保外就医的犯人、原湖南湘潭市人民政府资料员陈里宁（33岁）。陈里宁本人患有精神病，50年代末就担心刘少奇反毛泽东。60年代初开始不断写信、写日记，抨击刘少奇，后被逮捕关押。“红教联”如获至宝，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个别工作人员的首肯，与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医学院和红卫医院的有关造反派组织在红卫医院成立了为陈里宁翻案的“联络站”。1月6日，这些造反派组织上百人冲进陈里宁曾被关押的公安部下属的一所监狱，大闹为陈里宁平反。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大员王力、戚本禹等人亲临红卫医院，上午接见各单位造反派组织代表，下午接见陈里宁等人，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鼓励“必须彻底造精神病院的反！全国有类似的精神病院，都要造反！”2月，迫于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群众的压力，公安部给陈里宁开了“平反释放证”，后又开了“无罪释放证”。

一时间，陈里宁被捧为反刘少奇的“英雄”，红遍京城内外，四处讲演，还来清华大学作了一场报告。“红教联”有关人员根据陈里宁的反刘少奇材料、日记、书信等编写了一个话剧剧本《狂人日记》，广为流传。天津市人民话剧院一群众组织把该话剧改编为《新时代的狂人》，在京津等地多次演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演出了该话剧。中央戏剧学院的几个群众组织还编演同一题材的多幕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1967年7月底8月初，在中南海西门外的所谓“揪刘火线”上，一些群众组织也演出《新时代的狂人》一剧，给“揪刘火线”上的造反派群众助阵打气。陈里宁自被释放出不久，病态显露，加上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小组几个大员垮台，再加上陈里宁昔日反毛泽东的老底又被揭出，公安部把陈里宁重新逮捕归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段仅约700字的记述，我能查证出来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就有以下多处，

1、陈里宁不是“保外就医的犯人”。

亲历者陶德坚等和当时经办此事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记述，是“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北京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文革初改名为红卫医院）治疗。陈里宁是被秘密逮捕的，被捕后家人不知其下落。（陶德坚《风雨人生》：精神病？政治犯？，王广宇：《“陈里宁事件”始末》）到安定医院作为精神病人治疗，不是他的家人办理是事实，唐少杰说是保外就医，需要拿出新的人证或物证，他没有，我看他根本就拿不出来。再说陈里宁在当时未按法律程序审判，更未定罪，唐少杰何能在现在还称他为“犯人”。

2、“红教工等”并未“冲进监狱”。

亲历者的记述，所进入的是管理监狱的十三局办公区而不是监狱，办公区在前院，监狱在后院，他们事先告诫，在现场采取措施，防止误入监狱（陶德坚《风雨人生》：精神病？政治犯？》）尽管这种行为也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与“冲进监狱”是两回事。

### 3、《狂人日记》不是剧本。

唐少杰说：“‘红教联’有关人员根据陈里宁的反刘少奇材料、日记、书信等编写了一个话剧剧本《狂人日记》，广为流传。天津市人民话剧院一群众组织把该话剧改编为《新时代的狂人》，在京津等地多次演出。”但《狂人日记》是陈里宁的原始材料的选编，根本不是剧本。由此可以证明作为研究文革史专家的唐少杰，或者是没有见过这本《狂人日记》，或者见过但不顾事实按自己的需要在说话。

### 4、不能简单认为公安部把陈里宁重新逮捕归案是因昔日反毛泽东的老底又被揭出。

因为陈里宁涂改毛泽东的书，在他的档案中，公安部主办此事的人员最先知道也最清楚，不存在是别人隐瞒不举，责任在陶德坚等人的问题。对陈里宁是捕是放的权力也在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手中。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谢富治签署的，陈里宁无罪释放证明也是谢富治亲笔签发的。对陈里宁释放后发生的事情，德坚非亲历者，我的了解也有限，但各方留下的材料很多，谢富治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有复杂的原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但唐少杰却急急忙忙作了结论。

### 5、不能回避谢富治。

更需要提出的是，在整个“陈里宁事件”中，谢富治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或者说陈里宁之所以成为事件，就是由于谢富治的行为所造成。因为陈里宁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向党中央写信，对某些领导人提出意见，即使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违法的，那也应该按党章，宪法或相关法律法来解决，而不能由谢富治下令去“逮捕归案”。但唐少杰的介绍中却一律笼统用“公安部”来代替，而回避了谢富治。公安部内并非都赞成谢富治在陈里宁事件中的作为。

### 6、参与为陈里宁平反的是清华大学红教工而不是“红教联”。

发现陈里宁，在1966年12月，唐少杰明明知道此时红教联已改名红教工，他们在这行动中是以清华大学红教工的名称出现的，也有人作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一员来看待的，参加者后来分属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两派学生都有，当时留下的文件中，都没有“红教联”这个组织的名称，但唐少杰却在书中仍坚持称为“红教联”，正如硬要将“清兵入关”记成“后金兵入关”，违背了记述历史的规则。唐少杰为什么要这样写？应该由唐少杰自己来回答。不过从唐少杰的记述不难看出，意在说明“红教联”别有用心，并很难说不是想证明“红教联”是个“坏人的组织”，也许唐少杰会说我没有这样说，但从他将发现陈里宁形容为“‘红教联’如获至宝”，到“‘红教联’等搞出来的陈里宁事件完全是为了投机于当时的反刘少奇活动。”再联系到他将“红教联”的成立列为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和对“红教联”所作的不实的介绍来分析，不能不作出这样的解读。

更应该指出的是，唐少杰不仅是针对清华大学红教工，他还用了个“等”字，即北京医学院八一八战斗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安定医院红旗战斗队等学生、职工的群众组织都包括在内。须知为陈里宁平反，对那些普通的教师、学生、职工来说，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是担着风险的，有这样去投机的吗？唐少杰又如何解释当时那么多人都在投机？

因此只能认为唐少杰是带着偏见，特别是对清华大学红教工的偏见来写的，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论述。当然，唐少杰究竟是怎样想的，只有他自己最明白，不过至少反映出这位研究文革的专家，与参与文革的群众之间是多么隔膜。这也难怪，他没有亲身经历，但又不见引注一条资料，举出一件事实，作为支持立论的依据。

### （三）教师成立了个组织何以就成了清华文革的第一件大事？

《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将清华大学一些教师在1966年10月下旬成立“红教联”这个组织，列为“清华大学在百日大武斗之前所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之首。（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页47—49）但在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先生的回忆录《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北京第一版）中，不仅没有记录此事，全书通篇也未提到清华大学“红教联”或“红教工”；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理论家”周泉纁先生提出的“有关早期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大事记”中，也没有列入“红教联”成立，而是把“清华大学红卫兵”、“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思想”）红卫兵”“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成立列为大事。

“红教联”发展到“红教工”，成员也仅二百余人，主要是些普通的教师后来又有工人、实验员和其他职工参加，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弱势群体，哪有成为第一件大事的资格呢。但根本无视“红教联”或“红教工”的存在，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红教联”或“红教工”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又何必花费那样大的力量，甚至由康生出面点名批判陶德坚呢。从这一点来看，唐少杰在《一叶知秋》中说：“在清华文革初期，‘红教联’是一个很小而又非常典型的、以教职员为主体的群众组织。”是正视了历史。如仅止于此，应该说比较符合实际，但他把“红教联”的影响发挥为有左右清华团派的作用，则绝对是夸大了。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四一四派”头号人物沈如槐先生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记实》中，对“红教联”即“红教工”有所记述，还有一节，标题就叫“整红教联”，虽然他的了解和记录有不少不准确的地方，但他说“我们没有认真全面研究红教联的观点，仅仅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打击团派，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页133）；“把清华两大派斗争的阶级背景和“大翻个儿”论、极左思潮的阶级根源都归结到红教联的头上。”（同上书，页288）；“我们与团派的斗争每升一级，我们对红教联和陶德坚打击就升一级。”（同上书，页303）

徐海亮先生援引清华大学“团派”头号人物蒯大富先生的话说，“四派”毕竟不敢公开攻击堂堂正正的毛和文革小组（尽管心里严重不满），只有拿“中央文革的私生子”（“四派”批判原话）老蒯来打；打“团派”革命小将也不如死打“团派”所属的“红教联”及其影响的老师（年长的教授多倾向于团派！）。是来自另一方面的证明。

唐少杰先生致力于研究清华文革，应该对以上情况有了解，那么他根据那些事实和标准来把“红教联”的成立定为清华文革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呢？他没有说。不过从他说“‘红教联’最初共有成员30多人，绝大多数成员在文革前被定为有‘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或者遭到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坎坷。”和“（1967年）3月中旬，因名声问题，被迫自行解散”的用语来看。是因为“红教联”这些人是有问题的人，所以无须等他们有什么行动。建立组织一事本身该是一件大事。

陶德坚说，红教联刚成立，就有人放风说红教联是“神仙会”。在他们的眼里，让这些“神仙”也和他们一样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特别是“红教联”居然允许教授参加，那更是不能容忍

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除了他们自己，教师就等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授更是“右”字号，实际上是将“红教联”作为右派组织对待，“红教联”建立就是右派要翻天了，在“四一四派”建立总部前后，一些人归纳出“红教工的言论”，并与陶德坚1957年严重右倾，受过处分联系起来，称之为“红教工的言论代表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页130—131）就再明确不过了。唐少杰把“红教联”的成立便看成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其源应在于此；他不顾“红教联”已改名“红教工”，成员中有许多工人和职员这一事实，仍坚持使用“红教联”这一称谓，只能理解为是要突出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是拾当年整“红教工”那些人的唾余。

事实上“红教联”最初的成员，也并非唐少杰说的状况。所以陶德坚敢说，就是按共产党当时的政策标准，他们也不能在红教工中找出一个坏人，故只好用捕风捉影的手法，加给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详见沈孝宇事件）

再说红教工的解散，是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贵阳市棉纺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的夺权经验后，当时在清华以居于主流地位的井冈山兵团中的“团派”，要求下属各组织解散的统一行动，何来“因名声问题”被迫解散？此举倒是有压后来组成“四一四派”的组织解散之意，不过未遂。

作为文革研究专家的唐少杰，不知为何如此不顾事实，除了在“红教联”成员人身上做文章，还在重复“红教联”提出著名的“大翻个论”等等，继续使用当年搞派性攻击的材料和腔调，实在令人遗憾。对此，我将继续用事实一一予以批驳。

#### （四）谁提出了“大翻个论”？

《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中说：“红教联”提出了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即“文化大革命真是大变动，左、中、右大倒个”、“十七年的左、中、右颠倒过来了”，“现在的好人要从过去的坏人中去找”，“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要提高到理论上认识这种变动的必然性”。“红教联”一些人主张：“今天文革的左派要到过去的右派中寻找，而今天文革的右派要到过去的左派中寻找。”个别人甚至提出重新评价1957年的“反右”运动。（唐少杰著，200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49）

他在2005年又重复了一次：清华大学“文革”初期一个主要由教师组成的激进群众派别“红教联”所概括的：“文革”中的左派要到“十七年”的右派里去找，“文革”中的右派要到“十七年”的左派里去找；“文革”真是使“左”、“右”派来了个大对调，即“‘文革’中的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来了个大翻个儿”。（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见《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4月）

这些东西，在清华两派斗争和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组成的专案组都曾作为和红教工及陶德坚的反动言论，欲加之罪，遗憾的是到最后他们也没有能以此定案。究竟是红教工什么文件材料提出过所谓“大翻个论”？那些打了引号的话，是何人何时在何处所讲，或书于大字报？陶德坚要求拿出证据，这个一直工作到迟群、谢静宜垮台后的专案组，始终也未拿出来，因为事实是红教工或红教联都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大翻个论”。

那么这个“大翻个论”是哪里来的呢？当时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一号人物沈如槐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原来起因是1967年11月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代表的这一派即“团派”贴出两篇大字报，《险峰》战斗组的《浅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鲍长康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大翻个》，内称“1949年解放以后清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要多，已经遍布全

校各单位，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即特权阶层，在清华实行所谓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他们善于打着红旗反红旗，具有‘红皮白心萝卜’的特点，比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坏、更危险；他们有政治资本，掌握实权，他们是蒋南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依靠力量，……”沈如槐还说，“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得到了个别中上层干部的赞同，“与此同时，蒯大富、鲍长康等人接受了我们4 1 4给他们归纳的‘大翻个儿论’，他们现在开始理直气壮地说：清华园就是要大翻个儿，教育界也必须大翻个儿！”“根据团派的一贯思路和所作所为，他们提出这些论点是不足为怪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有根有据的”。（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页280—281）

沈如槐说“四一四派”与“团派”针锋相对，“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组织炮制了六篇文章”，评“大翻个儿”的理论与实际。其中第三评是《评红教联》，重点批判红教联的观点，把清华两大派斗争的阶级背景和“大翻个儿论”、极左思潮的阶级根源都归结到红教联的头上。

沈如槐先生说的是实话。“大翻个儿论”不仅“红教联”没提出过，清华大学“团派”也是在“四一四派”给他们归纳出来后蒯大富们才干脆接受下来的。而这个“大翻个儿论”在鲍长康（团派二号人物）等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大翻个》等大字报中有系统阐述，唐少杰对内容比较完整最有代表性的大字报置之不顾，却所引的一些不知何人何时在什么情况下说的片言只语，以作为“红教联”提出著名的“大翻个论”的根据，研究文革的专家却沿用文革中打派仗的手法，实在是令人惊奇。

联系到唐少杰把“红教联”的建立就作为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第一件大事来看待，他这样处理，只能理解为是想说明红教联的资产阶级右派性质。这也是清华大学“四一四派”攻向“团派”的重炮，“红教工的言论代表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页131）。“四一四派”建立后不久，在5月11日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沈孝宇、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德坚的反动言行大会》，揪斗了陶德坚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党员青年教师沈孝宇。在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实》中承认了这一行动的错误，其中说“我们想搞陶德坚，但她的错误似乎还够不上批斗，只好拿他的丈夫沈孝宇出气”。（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页132）说起来实在荒唐，但这也是那个年代的真实。

更令人感慨的是，2007年2月1日因友人之邀与沈如槐先生相晤，在说明我才是陶德坚的丈夫后，沈先生反问：那为什么把沈与陶德坚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在陶德坚《风雨人生》“沈孝宇事件”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和评析，我只扼要地说了我的看法。因为沈的妻子1957年被划为右派，但他没有和妻子离婚；而在沈孝宇在因反工作队被打成反革命，翻过来成为北京地质学院红教联一个系的负责人后，又允许一个“摘帽右派”和一个不肯和被划成右派的女朋友断绝关系的教师参加他的战斗队，在清华园内一些人眼中，这就与右派差不多了。沈孝宇曾被清华大学红教工邀来介绍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心路历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自然更招忌讳，而也就被一些人用来整陶德坚与红教工。

在清华园，许多人是1957年的惊弓之鸟，谈右色变，1966年5月，运动一开始，针对清华党委的大字报刚刚出现，就有人在用“钱伟长笑了”警告人们，右派又在进攻了，许多人正是这样认识的，所以那时拥护清华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占压倒的优势；及至工作组进清华取代清华党委掌权，蒯大富等贴了工作组的大字报，又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得到“假左派、真右派”的帽子。历史的经验和现实都在告诉人们，“右”是沾不得的。这种思维方式深深控制着许多人的心灵，坚持称红教联而不称红教工，将红教工和沈孝宇捆在一起，都是给对方戴上右派帽子的策略的应用。事实表明这一手在清华园内很见效，由于康生介入陈里宁案件，更得到超出他们预期的战果。

四十年后再来看当时归纳出来的所谓“大翻个儿论”，许多提法无疑是不准确或错误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要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虽然多数党员干部支持“四一四派”，但“团派”仍在清华园内居于多数地位，即多数教授、教师、工人和实验员支持所谓“大翻个儿派”。

历史的裁判是公正的，在清华园内确实存在是非的颠倒，黄万里、钱伟长教授和袁永熙同志的遭遇就是最明显和为大家熟悉的例子。但无论对“大翻个儿论”是贬是褒，清华大学“红教联”没有提出过“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是事实，忠于事实是写历史的基本要求。唐少杰教授说“‘红教联’提出了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至少是不顾事实，至于他为什么要不顾事实，留待以后分析。

#### （五）“政治地位决定论”是怎么回事？

《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说了“‘红教联’提出了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后，又说：“红教联”还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政治地位即职位高低，决定了政治态度”，进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唐少杰著，200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49）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据我所知，红教联没有提出过什么“政治地位决定论”，所谓“政治地位决定论”是别人归纳出来的。这在当事人陶德坚的回忆录《风雨人生》中有记述，陶德坚说：

“当时，全校都在进行军训，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楼下（指在楼下房间内活动，反对红教工的万山红战斗组）又放出风来，说红教联有二百块的教授。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的原则，阶级是跟据其经济地位来划分的，这意思很清楚，教授的收入高，不能属于无产阶级，我们这个组织教授多，也自然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就是在说不许右派翻天，不过表现方法不同而已。我们红教联确实有一位每月工资在二百元以上的教授宋镜瀛，当时能拿到每月二百元以上的教授人数不多，他们的收入比一般人一个月只有几十元收入高不少，但和他们过去的待遇相比，则下降了许多。在一次军训学习会上，我从四清及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结合这篇毛的文章谈了我的学习体会：现在的中国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个人收入的工资就算多一点，也已不能用来剥削他人，在知识分子中，如援用过去在农村的作法，按其工资收入多少来划分阶级，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有些人工资外实际得到的好处，可以比工资更多；政治上的权力能使人得到这些好处，如果这个人不是用政治权力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用来谋求个人私利的话，那这就成了他的特权，政治地位越高，他能得到的好处越多。对这种搞特权的人来说，可以认为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在决定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所以在今天，一个拿四十元工资的干部，如果也以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即也有一定的特权，而又坚持不改，那他就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不会比一个拿二百元工资的教授更拥护文化大革命。红教联的成员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都能正确对待参加红教联的教授们，这些教授也感到红教联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刻钢板，油印，装订……什么具体工作都争着干，人都变得年轻了，他们一边工作还一边哼小曲呢。”（组织红教联枪打出头鸟）

而在过了不久，楼下那个“万山红”出的一份大字报，把陶德坚的这些发言摘出几句话，截头去尾后再拼起来，概括成为陶德坚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主张跟据政治地位的高低来划分阶级。所谓“政治地位决定论”的来由，陶德坚已说的清楚。

现在唐少杰将红教联变成了陶德坚，并说他们“进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但从陶德坚所记来看她的发言来看，“如果这个人不是用政治权力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用来谋求个人私利的话，”“如果也以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即也有一定的特权，



而又坚持不改，”都是有限制词语而非泛用。说“政治地位越高，他能得到的好处越多”是指有此可能，也非必然。那里是“斥责广大干部、党员”。唐少杰可以不相信陶德坚的说法，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必须拿出证据，现在他没有拿出来，只有自己说的话，而他并非当事人或亲历者。如果唐教授并无经过查证属实的事实依据，就在自己的著作中宣称“‘红教联’还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政治地位即职位高低，决定了政治态度’，进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是在误导公众，要负个人责任的。

须知将某人的片言只字抽象为什么“论”，是多年来罗织罪名的惯用手法。因为在归纳为某种论后，便可以就这此推演，把本来不是你的东西都加到你的头上，在那无理可讲，无法可依的年代，许多人深受其害。作为学者唐少杰先生应该不致于此吧。

~~~~~

## 【往事回首】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迫害林枫的

• 梁红伍 •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进行了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中央党校做落实政策和清查工作时，曾查阅、收集和整理了有关“康生问题”的资料，写出多份材料，上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转呈中央。本文就是依据当时的相关资料写成的。

### ◇ 康生指使中央高级党校“造反派”打倒林枫

“文化大革命”伊始，康生就下手整林枫。1966年6月20日，康生严厉指责林枫在中央高级党校“镇压革命群众”，同时还警告他说，“你要准备，有人提你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犯了路线错误”。6月29日，他还在党校校委（即党委）会议上，再次指责林枫“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

受到康生来校和讲话的鼓励，7月10日，党校的一名年轻学员贴出诬蔑林枫“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十大罪状”的大字报。8月13日，康生接见了大字报的作者以及另一名写过“炮轰黑校委”大字报的青年干部（后成为党校“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鼓励他们“坚持和林枫黑帮进行斗争”。第二天，两人按照康生的“指示精神”，贴出大字报，说“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末日到了”，并“呼吁全校革命同志向林枫黑帮猛攻”。这样，校内一夜之间贴出许多“炮轰林枫黑帮”的大字报。康生立即表示：“我欢迎、支持同志们的革命精神、革命态度。”8月16日，康生有一个针对林枫的批语在党校宣读：“你们应当彻底揭发、严肃批判这种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坐镇党校的曹轶欧还特别提醒：“要体会康老为什么写信给‘高级党校师生员工大会’。”曹的言外之意很明白，就是要党校群众以“师生员工大会”的形式取代党校校委，“夺林枫的权”。

8月19日，“造反派”指使一些人在校委召开的全校大会上，突然跳上主席台把林枫等人轰下来，给林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校园内游斗，进行人身侮辱。当晚，康生就接见了“造反派”的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党校斗争发展这么快，乱了就可以治。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又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搞深，没搞透，有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提到。不光包括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第二天，在全校批斗林枫的大会上，又传达了康生的“电话指示”：“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们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

挖透”；“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然，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康生的这个“指示”是公开支持对林枫进行变相武斗和人身侮辱，而“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这句话，则立即传遍全国，影响极其恶劣。

8月28日和30日，康生两次亲自跑到中央党校召开座谈会。他在总结讲话中居然说“党校是长期抗拒、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是有一条黑线联系着的”。这实际上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兼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而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正是马列学院。康生这样讲，是有意把林枫的所谓“问题”与刘少奇联系在一起。之后，看到林枫依然“不肯认错”的“顽固态度”，康生又多次指示党校“要开林枫的大会”，“向中央提罢林枫官的问题”。

9月19日至21日，在康生的多次催促下，由取代党校校委、以“造反派”为主的“联席会议”，连续3天组织大会批斗林枫。面对那些揭发和批判的不实之词，林枫一一作了有力的回击。他的强硬表现，使康生等人十分恼火。12月10日，康生对党校“造反派”负责人讲，“林彪同志说，反正这个人（指林枫）是彭真的死党”，再次催促党校“用签名的办法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林枫停职反省”，并具体授意“罢林枫官”的“四条理由”。康生还告诉他们，“后天在体育馆开大会，先斗彭真市委一批，第二批斗陆定一、林枫等人”，要他们“搞点票去参加”，“要准备斗林枫、贾震（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12月14日，康生派人将林枫押送到首都体育馆批斗大会现场。林枫不愧是条硬汉子，他拒不低头弯腰下跪，遭到几个“红卫兵”的暴打，造成重伤，当场昏迷不醒。不久，林枫被送到北京卫戍区关押。

12月23日，中央批发了康生指使党校以“斗争林枫大会”名义要求撤销林枫校长职务的报告。紧接着，康生派人与党校“造反派”一起，用两天时间抄了林枫的家，不仅翻箱倒柜查找所谓“林枫的黑材料”，而且乘机将家中财物实行掠夺性“查抄”，将所有贵重物品全部装车拉走。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短短几个月，林枫就被“彻底打倒”、“扫地出门”了。

#### ◇ 康生通过“专案审查”诬陷迫害林枫

康生是“林枫专案组”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直接指挥者。他在1966年9月21日接见党校“联席会议”代表时，一方面具体布置“如何开小会批斗林枫”，另一方面则提出要成立“林枫专案组”。随后，在中央“彭真专案组”之下设立了一个“林枫专案组”，人员从起初的8人发展到后来的24人。1968年2月，康生指令“党校也成立一个林枫专案组”，作为中央“林枫专案组”的“外围组织”。

“林枫专案组”成立之后，康生便有计划、有步骤地捏造“罪状”，进行诬陷迫害林枫的活动。1966年11月至1967年5月，康生指使专案组先后向中央政治局报送了诬陷林枫“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伪造历史，参加共产党是假、加入国民党是真”等4份“罪行报告”。此后，他一再强调“林枫的案子”要“集中精力，突破重点，重点是政治历史问题”，“党校要抽一些人协同搞林枫问题”。

1968年2月14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说：“九个月来，通过调查、审讯查清了林枫长期伪造历史、是个真国民党、假共产党的问题。但对他的其他政治历史问题，案情进展缓慢。”康生在“案情进展缓慢”底下画了一杠，批道：“应在党校组织专案组大力进行外地调查工作，查阅敌伪档案工作也要抓紧进行。”他对办案人员说：“×××（专案组负责人）的专案没有深入，进展也不那么快。譬如，林枫到底是什么东西，这要作出结论。”他有意引导专案组把“林枫的问题”和“刘少奇的问题”直接挂上钩。他说：“林枫是假共产党员，进一步怎么样？因为他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在康生的不断点拨和鼓动下，专案组

加强了“斗争火力”，对林枫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会式的审讯”和“逼供信”活动。而在康生捕风捉影、诱供指供下制造出的“林枫保存刘少奇四万元特务经费”的假案，则是这种“逼供信”行为中最突出、最典型的事例。

1968年3月9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写道，林枫谈到1936年刘少奇曾给他一张汇票，款额四万元，但林枫说不知道钱从何处来，又用到何处去。康生立即将这“四万元问题”与“1936年刘少奇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一事联系起来，认定这是“国民党给刘少奇的特务活动经费”。两天之后，在事情远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康生急不可耐地将此材料批转中央政治局。同时，他指使办案人员立即审讯林枫夫人郭明秋，明确提出，“今后要通过林枫、郭明秋突击刘少奇的问题”，说要把“四万元问题”作为打开“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的“突破口”。3月30日，康生又急忙将刚得到的逼供诱供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同日，林彪和康生下令“正式逮捕”林枫，关进秦城监狱。第二天，康生再次将一份诱供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

4月18日至26日，按照康生的指示，专案组人员到秦城监狱对林枫连续进行“突击审讯”，逼迫他承认“参与了内奸刘少奇勾结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交代“四万元的来历和用场”。林枫此时已经看穿康生的险恶用心，始终一言不发，以沉默和怒视进行顽强抗争。

就在对林枫进行“突击审讯”的同时，专案组在天津银行的档案中查出连名连号的4张存折卡片，每张金额1万元，署名分别为“王德仁”、“王德义”、“王德礼”、“王德智”。康生如获至宝，说“林枫四万元问题”是刘少奇“这个大叛徒集团的一个大突破口”。1968年5月6日，康生在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负责人时更加得意地说：“从口供中找证据，用证据来证实口供。例如四万块钱问题，去年林枫隐约讲过，但专案组没有重视，抓晚了。林枫好像装糊涂，我说要抓紧，可以问郭明秋。但又发生另一个问题，到底可信不可信？从口供中发现刘少奇一个大问题，但口供确实不确实？你们去调查。用了4张卡片，一下就落实了！”他又说，“这个问题是个大成绩”，“证明刘少奇三六年来到南京同蒋介石勾结”。很明显，康生一口咬住“四万元”不放，就是要“证明”存在一个“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

5月16日，康生批示将关于《刘少奇四万元特务活动经费的调查、审讯报告》上报中央，以虚假材料陷害刘少奇和林枫。其后，康生对中央党校“造反派”负责人谈及“四万元问题”时说：“分析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四万元问题，开始说宋子文给的，报到主席那里，主席说不合乎道理。后来又陈立夫给的，合道理，但要有证据。”可见，毛泽东当时就指出这种事情“不合乎道理”，但康生并未就此罢手。

后来，专案组查明“四张卡片”是东北军一个师长王南屏的小老婆盖淑勤的存折，同时又从中央档案馆查清那四万元是张闻天交给刘少奇的款项。专案组负责人经过思想斗争，才将此事通过康生上报毛泽东。

“四万元问题”真相大白之后，康生气急败坏，持续在“林枫专案组”中进行反“右倾”活动。为了使审讯人员在林枫面前“站稳立场”，1970年2月，康生开始在专案组大搞“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的“三查活动”，要求人人检查“右倾思想”，组织学习“彭真专案组”的“经验”，其中重要一条是“敢不敢把审查对象当作阶级敌人”。5月初，康生亲自到专案组作总结讲话，再次批评专案组负责人“右倾”，说他在审讯中“问郭明秋病情如何”、“给吕正操一支烟”是“阶级立场不稳”，要他“深刻检查”，并当场宣布撤销他的组长职务，将“党校林枫专案组”与“中央林枫专案组”合编为“联合专案组”，叫更加听命于他的中央党校军代表××当组长，由曹轶欧直接抓。

在大搞“四万元问题”的同时，康生还指挥专案组搞所谓林枫等人“以东北桃园三结义为中心，以营救张学良为名进行投敌叛变阴谋活动的罪行”，长时间对林枫等人进行审讯和逼供。从196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的一个月中，对林枫的审讯竟达28次之多。7月28日康生在专案组关于审讯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此材料颇重要，办案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效果，望继续努力”，还亲笔改写了报告。接着，专案组按照康生改写的报告稿抄报给他，康生遂于8月2日将《林枫营张叛党问题》的材料批报毛泽东和政治局，以新的虚假材料陷害林枫。

在康、曹的指使和压力下，1970年5月，专案组开始审讯林枫所谓“里通苏修、×修的罪行”以及“内奸嫌疑”问题。6月29日，康生将相关材料批转政治局，对林枫进行新一轮政治诬陷，一直持续到1973年。

就这样，在近5年的时间里，康生通过“专案审查”，先后给林枫罗织了“黑帮分子”、“内奸”、“特务”等10多项罪名；捏造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里通外国”、“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罪状”，在政治上将林枫置于死地。

#### ◇ 在监狱中折磨摧残林枫

如果说在康生亲自指挥下的政治诬陷和审讯逼供，对林枫的精神造成了无比痛苦的折磨，那么在康生一伙控制的监狱所实行的“法西斯式”虐待，则给林枫的身体造成了致命的摧残。

监狱的牢房阴暗而潮湿，床板离地面不足一尺。每当看守冲洗走廊时，污水就流进牢房。林枫要求将水排出，却无人理睬，连块抹布都不给，他只得把自己的衣袖撕下一块，将地面的污水蘸起来，拧到马桶里，就这样一点一点把牢房的污水排掉。冬夜寒冷，难以入睡，他就把脊背贴在刚能感觉到温度的暖气片上，熬过漫长的寒夜。由于牢房终年阴冷，他夏天也要穿着棉衣棉裤。衬衣实在太脏了，他只能用一只手（另一条胳膊已被打残）把衣服放在马桶里，淘几次，再放水冲几次，然后晾干。

夹杂着沙子的饭只送到牢门下方一个小洞旁，要自己去取。林枫的腰被打坏，弯不下去，只得爬着去取饭。“提审”常常超过开饭时间，因为没能及时把饭盒放回小洞旁，就不给盛饭，就被饿上一顿。林枫后来说，如果再晚些出监狱，我连取饭的气力都没有了，连饭也吃不上了。他入院体检时，医生问他，“放风时能见到太阳吗”？他回答说：“四年中只见过24小时阳光”。医生噙着泪水，悲愤地摇着头，无声地谴责这种惨无人道的虐待行为。

长期的监牢折磨，致使林枫原有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大大加重，同时又增加了严重的肺病和关节炎。1972年七八月，狱中的林枫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奄奄一息。这年8月，他的6名子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如实反映父亲的病情。8月13日，毛泽东作出“放他出来治病”的批示，并斥责“过去办案似有逼供信”。这实际上是对康生一伙的严厉批评。但狠毒的康生一伙并不肯罢手，在林枫出狱住进医院后，他们一方面指示专案组要对林枫“继续审查”，另一方面则以新的更加卑劣的方式残害林枫。林枫出狱住进的医院，是由公安机关管辖的病房区，这里的“病房”实际是“变相牢房”。病房不大，四五个人挤在一起，空气恶浊，地面潮湿。更甚的是，竟然把身患重病的林枫列为“轻病号”，指派他给其他重病号端屎倒尿，还不许他对外讲。林枫直到去世前才对老伴郭明秋说出这件事。

1972年12月，阜外医院在上送的《林枫病情报告》中明确写道：“由于各种病之间互相都有影响，且病情又较重、较复杂，随时可能加剧病情恶化而发生危险。”

1977年9月29日，林枫含冤去世，终于没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受困于“文革”中的成都军区一把手

• 尹家民 •

◇ 毛泽东要求尽快给张国华下个结论

1965年，中央决定，西藏工委从9月1日起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张国华任第一书记。然而，还不到一年时间，正当张国华踌躇满志建设西藏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此后，西藏和内地一样，一片混乱。从城镇到农牧区乃至边境地区，到处都在造反。他们揪住张国华不放，张国华的“帽子”已经戴了13顶。张国华发高烧好几天，白天应付造反派，晚上到医院打针。一个好心的医生把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十分关注西藏局势，也关心着张国华。他指示童小鹏：“小鹏啊，通知空军，派个飞机把国华同志接到北京。”

张国华还没到，西藏驻京办事处的造反派就得到了消息，闯到张国华在北京的家，他们逼问张国华的妻子樊近真：“总理说了，张国华要回来了，你把人交出来！”

樊近真气不打一处来：“你们是听的广播，我也是听的广播，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造反派没有找到人，气急败坏地走了。夜里2点多，张国华才推开北京的家门。樊近真还没睡，看见张国华脸肿得厉害，往床边一坐就起不来了。樊近真问他吃点什么，张国华说别忙了，要弄就弄点稀饭吧。樊近真见张国华脚也肿得跟馒头似的，说洗洗脚能消肿。可张国华怎么也脱不下毛裤，孩子们也来帮着脱，可腿肿得根本脱不下。张国华喃喃说道：“我已经四个月没脱衣服上床了……”这时，周恩来了电话，让他到京西宾馆去。张国华从床上坐起来，一看表已经5点多了，说总理打电话总有事，不用休息了。

张国华出门刚上车，一辆小车在他家门口戛然而止，车上的人下来走近张国华，贴近他耳朵窃语：“先到人民大会堂。”张国华到了人民大会堂，才知是毛泽东接见他们18位将领，其中还有许世友。许世友气鼓鼓地上前一步跟毛泽东理论：“我们犯了什么罪……”张国华就站在许世友旁边，暗中扯他的衣角叫他不要说。毛泽东看着将军们个个被整得变了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中国现在就像回到了分裂成八百个诸侯的战国时期。”他要求军队帮助恢复秩序。

两天后，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叫樊近真也去，谈谈西藏驻京办事处的运动情况。

西藏那边的造反派要打倒张国华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得已，1967年2月6日，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了电报，其中说：“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认为张国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说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群众因不明真相，动荡很大，军区机关一部分干部和驻拉萨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也出现了思想混乱。此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

电报很快转到毛泽东手里。2月7日，毛泽东看了这份电报，在上面作了批语：“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

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2月12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又给“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复电，指出中央军委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群众做些工作。

这个电报给张国华撑了腰。3月初，张国华准备回西藏，周恩来拉住他说：“要解决四川问题，你是西藏的书记，也是西南局书记之一，你留下听听吧。”以后凡是四川问题，周恩来和叶剑英总要拉上张国华，征求他的意见。当时四川的情形是刘结挺、张西挺投靠了康生、江青，林彪又在那里找军队的代理人，使四川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周恩来和叶剑英商量，让张国华去四川任职。报到毛泽东那里，也得到同意。林彪对这件事很不满意。原先与张国华挺热情的黄永胜，马上表现出冷淡，在一个食堂吃饭，遇见也不和张国华及其家人打招呼了。

#### ◇ 中央派张国华、梁兴初入川

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作了书面批示。大意是：绝不容许右派群众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硬要冲，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可以退到二楼，继续做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可以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进一步强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们回去。这个批示，林彪看过后转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在他主持的一个军委扩大会上作了传达。

在这前后，军队与激进派发生了严重冲突，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四川就发生了所谓“二月镇反”事件，在《军委八条》下达以后，成都军区由于支持大派“产业军”而受到激进派越来越猛烈的攻击。2月17日，军委秘书长批发了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从2月18日开始，成都军区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川用飞机散发这封公开信。

公开信宣传了中共中央1月14日《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宣传了《军委八条》，指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提出“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口号，向军区静坐示威，在军区营门外搭棚围困军区机关，围攻军区人员，企图冲击军区是严重违反中共中央的决定的，劝告参加静坐示威，围困军区的群众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煽动捣乱，尽快撤离军区。同时，警告造反派组织头头，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决定，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区机关，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

激进派认为他们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这些话一点也听不进去，他们更加激烈地冲击军区机关。军区先是退让，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抓了许多人。矛盾更加尖锐了，军区很快又放了许多人。

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军区的一些干部？战士和“产业军”不服这一决定，两大派之间此后的争斗更加激烈？在这份中央文件中，还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

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

1967年5月，张国华奉调四川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梁兴初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原为十八军军长，率部进藏，在中印边界之战中功不可没，其人面目清秀，话语不多，有儒将之风。梁兴初是原三十八军军长，在朝鲜战场打得很漂亮。三十八军有“万岁军”之称。梁本人打铁出身，作战勇猛，身高1.8米，脸瘦牙大，背后就有人喊他“梁大牙”。从性格上说，两人搭班子应该是互为弥补，相得益彰。张国华和梁兴初入川工作时，毛泽东在谈话中曾叫他们去看看成都武侯祠门上的一副对联，那副对联写的是“世外人法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但对联的含义是比较复杂的，就像四川的形势一样。

上任伊始，张国华坐镇成都，梁兴初则赶往武斗重灾区重庆，平息两派武斗，收缴枪支。

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刘结挺、张西挺，人称“二挺”，是领导干部中的激进派，较早就站在了造反派一边。1967年冬，四川造反组织分成两派。梁兴初入川后，两派都叫他表态，但梁兴初的回答是：“统统枪毙！”这一下可惹火了造反派，第二天，“打倒梁大牙”的大字报就上了墙。

#### ◇ 江青不满意入川后的文武二将

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10万人。中国人多得很，四川也不少。你抓错了，放了就是了。你说问题不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

张国华回答：“还剩500人，都是坏人。”

毛泽东继续说：“你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22年，从1927年到1949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1969年4月11日下午5时，中央开会时，毛泽东又问张国华：“现在没有人反你了吧！还有人打倒你吗？原来要打倒你这个土皇帝的，西藏叫他土皇帝，也来了嘛！所以不要认为反对过你的人都不好。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张国华说：“是的，有几百部电台。”

1969年9月，梁兴初到川东动员两派大联合。两派头头互不相让，各说各的理。一天，梁兴初把两派头头找来，并在会场四周布置了许多游动哨兵。两派头头进场落座，梁兴初突然举起拳头砸在桌上，大骂道：“你们是造反派，我也是造反派，我是跟毛主席造了反动派20多年的反，造得有理，造出了一个新中国。你们也自称造反派？毛主席早就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就是当耳边风，公然哄抢军队的武器，打群众，打解放军，这是造的哪门子反？……”随后，他采取果断措施，对武斗干将及一些造反头目，该抓的抓，该关的关，并收缴了各派枪支。

张国华、梁兴初到任后，基本上还是按中央军委的要求办的，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此很不满意？在一次会议上，江青指着梁兴初大骂道：“你梁兴初胆大包天，敢说造反派是造毛主席的反！”梁兴初据理力争，江青怒不可遏。周恩来说了几句好话，替梁兴初开脱，江青才忍下这口气。她又把怒气转向张国华：

“真能抓，逮捕了十万多人，是否李井泉的阴魂不散，揭盖子才行？李井泉这个人残暴得很，我接到一封信，为了保护这个人，怕信丢了，不敢把信留下，把它烧了。李井泉要杀人灭口，很残暴。抓十万人，搞死了多少？”

张国华和李井泉以往的关系很密切，李被打倒，张国华心里也不好受，所以他淡淡地说：“死的不多，有搞残废的。”

江青一下意识到什么，追问道：“你们认为形势怎样？”张国华还是一派平静：“我们认为形势是好的。”江青很不满，指责张国华：“你的发言两小时，客观的报道，你像个记者一样，不知道你的倾向性是什么？”

在这种场合，张国华知道争辩没有好结果，只好笼统地承认：“对我们的批评很尖锐，很严肃。”总算躲过了更大的责难。

#### ◇ 梁兴初受“九一三”事件牵连

1970年庐山会议结束后，张国华、梁兴初回到成都传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1971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9月14日，张国华打电话告诉梁兴初：“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逃跑了。军区接到通知要加强战备。”梁兴初很是纳闷：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不是陈伯达吗？现在正在批陈整风，陈肯定已被监控，怎么可能带着老婆逃跑呢？他又转念一想，会不会是康生？可康生这么个人逃跑用得着加强战备吗？梁兴初百思不得其解，就给他熟悉的战友黄永胜打电话：“听说庐山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跑了？”

黄永胜也没有多少话，只是简短地回答：“是，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跑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梁兴初还是弄不清到底是谁逃跑了。他又打电话问铁道兵政委宋维轼，宋维轼回答得更奇怪：“我刚吃了安眠药，吃得有点多了，头痛得很。”

梁兴初越问越糊涂，越问越觉得其中有蹊跷？后来他终于弄明白了，也很吃惊，逃跑的竟是林彪。他的心情有些沉重，回到军区机关后，赶紧抓紧战备工作。

10月27日，中央召集张国华、梁兴初等人到北京开会，汇报四川的工作。

梁兴初如实向中央报告了自己在庐山会议西南组的发言，并报告了“文革”期间两次到林彪住处的详细情况：“第一次是和张国华一起去的。林彪说，四川我们不放心，你们两人去了，就放心了。然后留我们喝了茶。第二次是请我们去看电影。这次人很多，林彪只和我握了握手，什么也没说就开始放电影了。林彪搞政变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跑了以后十天才从中央文件上知道了详细情况。”

11月13日，叶剑英处通知：14日晚毛泽东要接见军区领导。接见时，叶剑英说：“有人说梁兴初到成都是去夺权的。这不对。梁兴初到成都，是我向毛主席建议的，是毛主席点的



将。”

在接见时，毛泽东指着梁兴初说：鲁迅说曹聚仁“喝了他家的茶，就是他家的人”，“你喝了林彪的茶，不是林彪的人嘛”。梁兴初对毛泽东说的这段典故不甚明了，但说自己“不是林彪的人”几个字，却听得十分真切。

11月15日，梁兴初一行从北京回到成都。16日，张国华的秘书通知梁兴初到金牛坝开会。

金牛坝是四川省委高干招待所，会议由常委扩大会议发展成党委扩大会议，解决所谓“梁兴初的问题”，会上火药味越来越浓，要梁兴初交代怎样“上了林彪的贼船”；九届二中全会怎么“搞串联”；吴法宪如何窜到西南组的；“九一三”前为什么“捂盖子，保林彪”；怎样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为什么调走警卫营，给新警卫营配新式武器；为什么林彪摔死后还给黄永胜打电话等等。

梁兴初没有回避历史上与林彪的关系，也诚恳地检讨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但对有人指责的“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则断然否认。

11月19日，军区政治部通知梁兴初的夫人任桂兰，到金牛坝去敦促梁兴初交代问题。第二天，梁兴初被隔离审查，门口站上了岗。从此，梁兴初夫妇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

#### ◇ 张国华的逝世竟与梁兴初挂上了钩

西南地区依然很乱。周恩来和张国华保持着密切联系，有事直接打电话。后来，四川省委改选，张国华又担任了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对他的任命招来了各派的攻击，甚至有人要整死他。

1972年2月21日，由于过度劳累，张国华在主持解决四川大学问题的会议上，猝然病发，倒在会场上。党中央闻讯，立即派出专家小组抢救。专家小组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连夜飞往成都，但未能奏效。不满58岁的张国华再也没有起来。

悲痛中，传来周恩来的三点指示：一、国华同志的工作由李大章代理；二、查清死因；三、骨灰送到北京。

原准备2月24日至26日送骨灰回京，但正赶上周恩来秘密访问越南，只好推迟几天。周恩来一到越南，就伤心地对驻越大使王幼平说：“知道吗，国华同志死了。”

王幼平是张国华的老战友，闻讯大吃一惊。周恩来一边说一边流泪，说到后来，周恩来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与王幼平相对而泣。

3月11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张国华的骨灰被运到北京西郊机场后，周恩来抽身亲往机场迎接。周恩来一生只去机场接过两个人的骨灰，除了张国华，另一个是陈赓大将。寒风中的周恩来接过张国华的骨灰，伤心得不能自持，潸然泪下：“中央正要重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

不久，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当周恩来询问毛泽东是否接见与会人员时，一般情况下，毛泽东总是满足地方干部的愿望，但这次却执意不从。他拍了一下沙发扶手，神色

黯然，许久，叹了一口气：“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张国华死后，有一些人联名上告，说“张国华是门诊部主任、梁兴初的老婆任桂兰迫害致死的”。

2月26日，梁兴初心脏病发作，中央批准他到北京301医院治疗，至9月出院。

梁兴初在北京治病期间，四川省委、成都军区于3月19日向中央递交报告，称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8月，又报告“在四川，梁、陈、谢上了贼船，梁兴初是头子。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梁参与了林彪反革命政变活动”。

1973年3月6日，梁兴初和陈仁麒接通知来到总政，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与他俩谈话，说中央决定二人下放到工厂“劳动锻炼”，并继续接受审查。梁兴初到山西太原，陈仁麒到甘肃兰州。从此，梁兴初度过了长达八年的下放审查岁月。

在这期间，不时有人找他们核查：找梁兴初的主要是查“梁兴初的班底”；找任桂兰的，主要是查证她与张国华被害一事的关系。任桂兰说：我已经给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张国华死前几个月我就被隔离了，还怎么害他？再说，我在门诊部工作时也不管保健，首长吃药我无权开处方。这点你们要是不相信，门诊部里保存着处方，可以去查嘛。

1979年，梁兴初让任桂兰将自己的辩白材料送到北京原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家，通过吴信泉，将材料递交到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手中。

9月14日，黄克诚在一次纪检会议上指出，说梁兴初反对毛主席，上了林彪的贼船，你们成都审查近十年，竟拿不出一件站得住脚的事实？这是对老同志的不负责。梁兴初，一个打铁的，从小参加红军，受过九次伤，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他能反对毛主席吗？

1979年下半年，梁兴初被解除劳动改造，从义井化工厂搬到太原。1980年11月，北京军区通知梁兴初搬到北京军区赵家楼招待所暂住。

1981年10月23日，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呈递了《关于梁兴初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中说：

一、梁兴初同志的问题，经反复调查核实，现已查清，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1. 1970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8月23日林彪抛出了动员“讲话”，24日吴法宪在西南组作了煽风点火的发言之后，当晚把梁兴初、谢家祥找去他的住处。吴向他们讲：“我们是老同志，一定要发言表明态度，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梁兴初第二天按照吴法宪的布置，在西南组会上发了言。当中央指出黄、吴、叶、李、邱问题之后到1971年“九一三”以前，梁兴初一直没有揭发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串联活动。2. 梁兴初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违犯党的纪律，私自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那个动员“讲话”抄了一份，带回成都后，进行过一些扩散……

二、经审查，梁兴初同志未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有牵连。中央（1972）14、3号文件中关于梁兴初同志上了林彪的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的定性，建议予以撤销。

三、梁兴初同志在我党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有错误，但本人认错态度较好，同时还考

考虑到当时历史条件和本人在历史上为党为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按照党的一贯政策，建议不给处分。

后来，中央研究决定，免除梁兴初党内外一切处分，按大军区正职待遇。在总政与其商谈工作安排时，梁兴初提出离休。

1985年10月5日凌晨，一代战将梁兴初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 《党史博览》2006年第12期

~~~~~

【旧文回放】

### 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

• 林豆豆 •

我到报社工作以后，把爸爸对我陆续讲过的一些关于怎样写文章的问题，尽量回忆了一下，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同志看了感到很有帮助，一再要看。最近报社领导要我整理出来作为内部学习材料。因为我的理解能力低，记忆又不可能很准，肯定会有不少错漏和不确切的地方。由于这些材料都是针对我个人的情况讲的，不一定适合其他同志，特别是没有经过爸爸看过，更感到没有把握，只能供空军报社的同志们参考，希勿外传。

先从写短文说起吧。最近，爸爸看过5月27日、7月6日、我在《空军报》上发表的《壮志凌云》和《根深才能叶茂》两篇短文以后，很高兴，特意把它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报上的字很小，就让别人念给他听，还专门从外地打电话鼓励我说：这两篇文章写得不错，没有党八股的框框，具有短小精悍，新颖活泼的风格。前一篇《解放军报》还转载了，标题改为《这种英雄最可敬》，改得也好。他还说：看到后一代的成长，心里很喜欢，虽然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我头开的好，方向对头。

爸爸说：短评和随笔这些形式很好，以后可以多写，它是批判错误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传播新的思想，宣传英雄人物的有力武器。不要写那些又臭又长，干干巴巴的文章，这种文章像机器造出来的一样，只有零度的感情，就会使人感到没有兴趣。有些复杂的，重要的问题，短了说不清楚，也可以长些，长而空不好，短而空也不好。你要特别注意学习毛主席《反对党八股》一文，还不仅对提高思想有很大好处，而且对写好文章，尤其是写好短文也很有好处。

关于文章的体裁和风格。爸爸曾说，你年龄小，阅历少，身体又不太好，不要去写大部头的小说，更不要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可以像现在这样，常写些短文、散文，还可以写些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兼有小说和论文作用的一种体裁。报告文学与政治生活联系更密切，又有感染力，对人民的现实教育作用更大。

写文章要有自己的风格，但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各种风格，各种体裁都可以学一学。我讲的不是漫无边际的学，而是有选择的学，从内容上来讲，主要的是学正面的，特别要抓住一个较好的作家，一种较好的体裁，一篇较好的文章，反复学习，多读精练，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一段时间内突破一种文体，就会见效。多种风格的文章都学，都练。这样天长日久，就会摸出路子来，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是学习别人的作品，特别是一些旧的作家的作品，要有分析态度，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旧的作家的思想感情不对头，他们的立脚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方面，“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的王国。”他们的作品是抒发个人感情的，是颓废的，低沉的。千万不要学这些东西。你要逐渐形成的风格，应当是充满革命激情的，非常正常化的，调子很高昂的，这才是革命文学的风格。

世界上的文学作品多得很，一火车也装不完，哪一篇也不一样，没有什么固定的写作方法。不像数理化，出一个题目有一个答案。作文出一个题目，一个人有一个作法。所以，不要迷信什么框框，要敢于创造，根据革命斗争和群众生活的需要，在不断实践和不断提高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像写毛笔字一样，要先临帖，以后就慢慢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完全写的和字帖一样，不可能，也不好看。历代大书法家都是自成一体的。所以写文章，既要学习别人，又不要完全摹仿别人，写多了，写熟了，熟能生巧，巧能生华，就产生了自己的风格。对自己的风格，不要自惭自秽轻易抛掉，要自觉地把它巩固起来，并在实践中不断锤炼、提高。

关于练基本功。爸爸说，写文章要“三过硬”。首先要思想过硬。这不是一下子能硬起来的，要靠一辈子学习毛主席著作，靠在长期复杂的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观察力，判断能力。衡量文章的好坏，第一条是政治标准。因此，必须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这两句话，爸爸非常重视，在我走向工作单位的时候，还专门用这一教导亲笔给我题词，要我贴在墙上，把它当作工作中座右铭）紧紧依靠党组织，歌颂新社会，打击反对派。每一篇文章，主题思想一定要明确，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这样才有灵魂。对党有利的事就拥护，对党不利的事就反对。

还应当明确，你们写的作品、文章，是要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是要和当前斗争紧密结合的，适应当前斗争需要的，作品、文章是教育人、改造人的。因此首先必须很好的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毛主席说：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怎么能写出充满革命思想的作品呢？常言说：己不正焉能正人。我们提倡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改造灵魂的工程师首先自己必须有纯正的无产阶级灵魂也是这个道理。创造是艰苦的，有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革命的思想感情，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写出好作品，懒人是一辈子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这个道理真正懂得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你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基本课，一定要随身带着，经常读，反复读，而且要精读，遇到问题就去查。要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提高自己。

生活过硬。就是要无条件的和工农兵结合。毛主席说：文科的实验是社会，你就要把社会当实验室，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确立劳动人民的感情，特别要积极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看，现在成功的作品、文章，那一篇不是深入实际搞出来的？就拿你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来说，《董叔叔》（载于《解放军文艺》1962年1月）、《悼念敬爱的刘亚楼叔叔》（载于《解放军报》1965年5月12日）、《雨后扬州》等较好的几篇，要没有直接的生活感受能写得出来吗？这一条要抓住，要坚持。不过，生活在实践中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问题，想出办法，写出作品的，还要有勤用脑的习惯，就像搞调查，光调查不研究不行，还要有抽象概括，提高的本事，调查研究要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吸收进来。深入生活，还要会观察生活，会联想，多想国家大事，党的大事，阶级斗争的大事，世界革命的大事，这样立脚点就高，胸怀就开阔，就会有气魄，就不至于变得鼠目寸光，只拘于生活小节。

写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主要是写人，写人的活思想，不能见物不见人。一篇文章没有人物，人家看完也就忘了。《雨后扬州》虽然写得不错，但是没有人物，所以就感人不深。过去为什么写不出东西，就是因为你怕人，见人就躲。要写出好作品，不但要接触人，还要懂得人

的心理感情，熟悉人的动作、语言。这样才能刻画出人的性格，有力的称颂英雄人物，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引起群众的注意，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这是人的因素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嘛！所以，平常要注意接触社会上的各种人，丰富感性知识。用聊天的方法往往可以发现很重要的问题。通过聊天，联想问题，发现思想，对写作有很大好处。新鲜的比喻，思想的闪光，既所谓灵感，要抓住不放，要“丝丝不断”，也就是使自己的思想像密集的雨丝一样，一滴一滴连成线。深入了生活，思想的火花会不断地迸发出来，成为“思想零件”。而好的思想，往往如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因此，必须抓住不放，使这些“零件”逐渐装配起来，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并使之逐步完善。写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样，只要做有心人，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得到最大的愉快。

技巧过硬。掌握词汇是一个重要方面。要留心学习各种各样的词汇、谚语、成语、典故。群众的、民间的、古典的、外来的都要学。主要是好的词汇，才能使文章生动简练，有立体感，增强艺术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一篇文章没有一句好的语言，就等于一碗白开水。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把语言词汇贫乏判为第四条罪状，并且形象地批评说：“在写文章作演说中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个健康的人。”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大文豪，都是注意学习词汇的。听说19世纪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就掌握了一万多条词汇，他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妮娜》发表后，为改一个词，就连夜从几十里的邮局里取回多次。他虽然不是无产阶级作家，但用词严谨缜密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又如我国革命作家鲁迅，他也是掌握了数量较多的词汇，用词极为严谨的。听说他翻译外国作品时，常常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几天寝食不安，一旦找到一个好的词汇时，就喜形于色，快不可言。另外，他从来“不造出自己除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也曾经提到了鲁迅这种精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不但思想性最强，文风最好，而且在运用词汇和成语典故方面也是最光辉的典范。例如：你们常读“老三篇”。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引用了精益求精，“见异思迁”；《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引用了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愚公移山》一文本身就是引用了中国古代《列子》《源问》篇的典故。所有这些，都用得非常自然，非常贴切，恰到好处。这样文章就写活了，就引人入胜，就感人至深。

掌握词汇也要下苦功夫。搜集方法，一是像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样，研究什么问题，写什么文章，就搜集什么词汇，二是随身带个小本子，做到“眼到、耳到、心到”，把随时看到的、听到的，随时记下来，还要不断地翻看，不断地联想，养成勤用脑的习惯。你应当向你妈妈学习，她那么大岁数了，工作又很忙碌，还经常注意和保存词汇。我们每逢发现一个能表达一种思想和能够说明一种生活规律的好词汇，都是如获至宝，赶快把它摘抄下来。你要把毛主席著作中的成语、典故、好的词汇，都摘出来，还可以搞成卡片，这样更便于学习。你学英文不是挺下功夫吗？学中文也应当像学英文那样练基本功。好的词汇、成语，以至范文，要能记住，甚至硬是要背下来。应该拿出学英文，背古文的劲头来学习词汇。但是抱着字典来背，即是背得头昏眼花也记不住。只有通过阅读、闲谈、写作以及编改部队来信，把单个的词汇和一个故事、一篇文章联系起来，才能记忆深刻。这样长期自觉地坚持下去，日积月累，就能占有大量词汇，不断运用，就会变成自己的东西。你不是看过苏州刺绣吗？为什么那么漂亮呢？就是因为丝线的品种很多，听说有4800多种，光红色的就有几十样。颜色的花样很多，所以绣出来的东西好看，逼真。写文章也是一样，词汇好比丝线，掌握词汇越多，就能运用自如，变化无穷，随手拈来就能选出那些浓淡相宜的颜色，“织成”最美好的作品。当然写文章主要是考虑思想，而不是考虑词汇。词汇主要是平时积累，积累多了，运用自如了，写文章的时候好的词汇就会从字里行间像炒豆似的蹦出来。用词也要慎重选择，用得自然，用得得体。不要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已经死去的陈词滥调，也不要故弄玄虚，堆砌词汇，在一篇文章里使用过多的词汇，会产生臃肿累赘，以词害义的毛病。

情节是使文章生动的因素之一。报告文学、小说、戏剧，为什么吸引人呢？因为有好的情节。如果平铺直叙，就没有味道。这里贯穿着辩证法，为什么说“要想甜，加点盐”？“此时无声胜有声”？就是这个道理。写一般的文章，“夹叙夹议”是一个好办法。单纯写景，素描式的文章，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行的。在叙述事实的同时，可以画龙点睛的议论一下，抒发感情讲点道理，这样的文章才有思想性，有战斗性，才有筋骨有骨，有血有肉，有神有态。

搞理论文章，就要“引经据典”。我们应给“引经据典”赋予新的涵义。我们所谓的“经”就是理论性的东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所谓的“典”就是典型事例，就是事实。这两方面都有了，结合的好了，就可以把文章写好。至于文章的格式，不要过分追求。格式是内容决定的。主要是先立意，然后打好腹稿，或写好提纲，再一气呵成，最后反复修改。精雕细刻。有了好的立意，作品就成功了一半，剩下的问题是采取各种手段来表达主题，精益求精。这样才能创造出政治性、艺术性都能过硬的好作品来。音乐也是如此，主调、旋律一创作出来，曲子就有了灵魂。文章的结构、层次比较好办。这些东西都不是死的，可以学别人的，也可以大胆创新。

一个作者有三方面都过硬，本领就大了。同样的题材，就可以写出比别人高一手的文章。像制造糖果一样，基本原料无非是糖、蛋、奶那么几种，但做出的花色品种却是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

关于文学的性质和学习问题，爸爸告诉我文学是具有阶级性的，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上层建筑，它不单纯是给人们以艺术享受，而主要是向人们进行思想教育。无产阶级的文学，是形象的通俗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工具，是用形象感染人教育人的工具。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搞文学创作，这是党给你的严肃的政治任务。文学的政治性是很强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是欺骗人的，腐蚀人的，我们是使人觉悟、提高人的因素的质量。他们的文学是麻醉品，我们的革命文学是觉悟品，他们是吃鸦片，我们是咖啡，鼓舞斗志。因此，搞文学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头脑，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极其严肃谨慎的态度，这一点是丝毫也含糊不得的。特别对你们这些革命子弟来说，不论做什么工作，对社会主义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你们应当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永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你们的思想水平应该很高，对自己要求应该很严，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对党的贡献应该是比普通的子弟更大些。你们表现如何，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你们的行动在一般人的眼睛中有政治作用。

针对我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爸爸指出，不要怕文章出问题，犯错误，只要努力学习，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处处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政治上对头，就不会犯错误。在工作中的错误总是难免的，不要太怕出错误，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敢想敢干嘛！现在你还幼稚，将来在不断地实践中会老练起来的。不要轻视文学，一篇好的作品、文章，会使群众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你搞报纸工作很好，要好好的读稿，虚心地学习，要读一些书，用什么，学什么，不读书的人，头脑中只有盲目性，没有自觉性。书也不能读得太多，世界上那么多的书就像百货大楼的东西一样，你能都买得了吗？要选最好、最有用的，反复读、反复用，还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听说你们报社有些同志书念的不多，在实际工作中都锻炼得很棒。他们都是你的老师，对你的帮助很大，应当很好的向他们学习。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报社的工作能够广泛的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是最好的学校。在报社工作，练笔的机会多，下去的机会也多，也是一个社会、小世界，也算解剖一个麻雀。将来要到空军各部门、各行业都跑一跑，了解情况，丰富生活，开阔视野。特别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和空军党委的号召，积极参加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政治教育的好课堂，尤其对你们这些新社会长大，没经过大风大浪，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没有直接感受的人来说，是一门不可缺少的基础课。希望你很好的到实际生

活中去，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做永远的彻底革命派。

□ 《文化大革命学习资料》 1968年1月4日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